

## 二、重用买办

要想明确官督商办企业是否存在买办性,必须先了解何谓买办。

买办源自葡萄牙文 Comprador,音译“康白度”,原指欧洲殖民者在印度所雇的当地管家。中文“买办”一词,在明朝指向宫廷供应用品的商人;在清前期,指公行贸易中,为住在广州商馆的外国商人服务的中国人,从事采买或管事等杂务。鸦片战争后,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第八款规定,洋行雇用买办“应各听其便”,“中国地方官勿庸经理”。买办从此成为外商自由雇用的雇员。出于商业上的需要,经过很短时间,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的外商,就不再把买办的职责限于内部杂务,而让他们参与业务经营,经常深入内地,或携带现款去采购用于出口的土货,或运销进口货物,起外商和华商中间的掮客作用。

一般所说的买办包括,正在被外商雇用的买办,以及买办出身的人。所谓买办出身,是指由当买办起家,以后改作别的事情的人,概念如同进士出身系由科举正途通过最高一级考试而起家者。

买办长期为国人所鄙视,把他们看作汉奸或准汉奸。这是因为买办制度源于洋行的业务需要,而恢复和增开广州以外的通商口岸和在所有通商口岸设立洋行又是西方列强依恃坚船利炮侵略中国的后果。这种情况下,买办受雇于洋行,帮助外商做生意,很容易被视同外商的爪牙、帮凶,认为是替外商赚中国人的钱。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西方列强以国家政权为毒泉的后盾,依靠暴力把鸦片贸易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这种罪恶行径令人发指。但对外开放和睁眼看世界对于近代中国是必要的,鸦片战争前夕民族英雄林则徐就已有这种见解。当中国被迫对外开放通商时,华商已无力单独搞外贸,进出口贸易便全为洋行控制。买办受雇于外

商,参与进出口贸易,负责进出口货物的集散,活跃市场,发展商品经济,不能算是坏事。经商就要牟利,同时也向社会提供了服务和承担风险,关键在于正确利用外资,学习人家的长处,通过发展民族商务来收回利权,而不是禁止、阻绝商务,不许赚钱。(当然,几乎所有洋行都为了追逐厚利而从事罪恶的鸦片贸易,这种毒品“服务”,中国人民深恶痛绝。)总而言之,受雇于外商做生意,是正当职业,无可厚非;应该把跟随外商做生意,与替外国政府或海盗的侵略军及其所建立的傀儡政权做事,严格区分开来,两者有着明确的界限,迥然不同。其实,许多买办有颇强的爱国之心。譬如,唐廷枢在担任怡和洋行买办时,因看到轮船上外商“待人不如羊,殊为可恨!于是在港集股银十万元,先租两船往来港、沪”。<sup>①</sup> 买办出身的郑观应,鉴于“自中外通商以来,彼族动肆横逆,我民日受欺凌,凡有血气,孰不欲结发厉戈,求与彼决一战哉!”而提出“习商战”<sup>②</sup>,要求“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sup>③</sup>。

买办在跟随外商从事经商活动的过程中发了财。然而买办积累财富并不靠受雇于洋行的薪水。光靠工资,连办公室都养不起。“同买办间的开支相比,买办所得的薪水是很少的。”琼记洋行买办刘绍宗“每月 20 两的薪水仅敷其买办间约 10% 的开支。”“薪水仅构成买办总收入的很小一部分。买办是从每一笔成交的交易中向外商收取佣金来积累起大笔资产的。”“但是,买办的主要收入来源既不是薪水,也不是佣金……买办作为华洋之间的居间人,他们

---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第 10 卷,船务,《复张君弼士书》,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828 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五卷本,第 3 卷,商战,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86 页。

③ 郑观应:《盛世危言》,十四卷本,第 2 卷,商战,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 595 页。

‘上下其手的机会比一般中国人或一般欧洲人所享有的何止十倍以上。’”<sup>①</sup>应当注意到，许多买办不仅是洋行的雇员，而且还是独立的商人。为了躲避官员的敲诈勒索，不但依恃外商洋行庇护，有的买办还自设“洋行”。因此，当时“洋行很多，但其中不少并不是洋商开设的，而是买办利用洋商的牌号做生意”<sup>②</sup>，雇个洋人代为出面而已。

买办积累起来的财富是相当可观的，他们是晚清时期的大富商，是取代广州行商的新兴富商。许多买办拥有数十万两的财产。曾担任过宝顺洋行买办的徐润，离开买办职务后继续扩充他的财力，到1883年时全部财产达白银340万两。<sup>③</sup>

买办被外商雇用，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中国近代企业产生时，风气未开，国内殷实的富翁中，大官绅、旧式商人尚无投资近代企业的意向，只有买办对此有积极性。买办投资实业，其例不胜枚举。19世纪60年代，旗昌轮船公司买办陈竹坪，即已投资于轮运业215,000两。<sup>④</sup>但“买办商人出于安全的需要，也出于逃避繁重捐税的需要”<sup>⑤</sup>，采取“诡寄洋行”的办法，其中包括托庇于外商洋行和自设洋行。至于稍小一点的富人，如上海钱庄主，虽是外资近代企业的中小股东，但无法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他们入股为的是获得丰厚的股息，甚至进行股票投机，与买办通过投资成为大

---

① [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110、113页。

② 聂宝璋：《洋行、买办与买办资产阶级》，载孙健编：《中国经济史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5页。

③ 徐润：《徐愚斋自述年谱》，第35页，《记地亩股票合业始终兴败事略》。

④ [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第150页。

⑤ 聂宝璋：《洋行、买办与买办资产阶级》，载孙健编：《中国经济史论文集》，第167页。

股东加入管理者行列截然不同。

买办不但赚得了大量财富,投资近代企业,还从外商那里学到了许多先进的经营管理知识,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唐廷枢在为怡和洋行试办北洋航线的轮运时,获得了竞争对手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洋东福士的好评:“在消息灵通和招揽华人业务方面唐景星或琼记的那个买办完全胜过我们。”<sup>①</sup>郑观应在为太古洋行办长江航运时,“选择熟识客商货多而可靠者,嘱渠分庄各口揽载,或加一九五用,或贴补房租,或货多准其荐一轮船买办,货至多者缺至优,以此羁縻,使其奋勉为我招徕”<sup>②</sup>,抢走了旗昌的老顾客,在水脚价格跌至一半时以常常满载而盈利,迫使曾垄断长江轮运的旗昌公司对太古做出全面让步。

买办积累了财富,又依附外商投资实业,跟外商学会了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成为当时国内唯一具有实践经验的有经济实力的肯于投资实业的富商群体。华侨商人也接受西方文化较多。不幸的是,在中国近代企业产生之际,国内守旧势力极大,他们不但阻挠商务,还荒谬地把离乡背井到海外谋生的赤子当作祖国的叛徒。因此,华侨巨商宁愿仍以所在国为基地,从事对祖国的海上贸易活动,而不敢返回故乡投资实业。只有中小侨商肯冒险回乡办小型近代企业,却遭当地官、民的迫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广东南海县的继昌隆缫丝厂。1873年春,暹罗侨商陈启沅,回到家乡广东南海县简村,“动用资金7000多两”,盖起厂房,置办锅炉、机器,采购蚕茧,雇用工人,创办继昌隆缫丝厂。至“翌年秋冬之交,大致就绪,正式开始生产。”受继昌隆鼓舞,南海举人陈植榘等,于光绪三四年间〔1877—1878年〕在简村对岸的学堂村建起裕昌厚缫丝厂。

<sup>①</sup> [美]刘广京:《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第181页。

<sup>②</sup> (郑观应:《盛世危言》,五卷本,第3卷,商务,附录《论招商局及肇兴公司事略》,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620页。

1881年,当地落后群众聚集千余人,以骚乱的形式捣毁裕昌厚。事后,南海知县非但不强化治安,反而“禁止裕昌厚复工,并饬继昌隆亦要停办。”在落后群众的暴力威胁及官员的迫害下,陈启沅“乃决定将继昌隆迁往澳门”。<sup>①</sup>因此,要想在当时倡导近代民用企业,迟早得重用买办。

李鸿章筹办轮船招商局时,最初信赖旧式商人上海沙船主,札委以沙船为世业的朱其昂主持局务。然而旧式商人的思想不开窍,有人劝沙船主们变卖旧业去投资近代轮运业,遭到强烈反对而“竟至势同水火”,沙船主们之间则“群起诧异,互相阻挠”<sup>②</sup>,朱其昂本人对出资办近代企业也很勉强,集资极不得力。当时的情况是,李鸿章为了大力倡导,不但垫借了淮军练饷制钱20万串,还倾倒私囊,自己率先入股5万两。即使如此,朱其昂也仅招得十几万两的认股(内含朱本人的3万两),交出的现银只有上海商人郁熙绳的1万两。<sup>③</sup>使李鸿章痛感“股分太少,恐至决裂”<sup>④</sup>。于是李去找上海知县广东香山人叶廷眷,不果。迟至这时,大买办唐廷枢和徐润才经李的幕僚盛宣怀引荐,进入招商局接手主持局务。轮船招商局的集资遂“大异初创之时”<sup>⑤</sup>,50万两股本迅速募齐(实收476 000两,留给朱其昂3万两)<sup>⑥</sup>，“皆唐、徐诸公因友及友,辗转

---

① 林金枝、庄为玑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1—256页。

② 《字林沪报》光绪九年十月十一日。

③ 《商局报告》,下册,第18页。

④ 《李集》,朋僚函稿,第13卷,第13页,《复沈幼丹船政》同治十二年闰六月初六日。

⑤ 《申报》1873年7月29日,《招商局情形》。

⑥ 《商局报告》,下册,第19页,第一届帐略。

邀集”<sup>①</sup>，其中徐润入股 12 万两。<sup>②</sup> 这就是说，李鸿章在办洋务民用企业的过程中，走过一段弯路，然后不自觉地不得不重用了买办资本，并使之转化为民族资本——这是当时的商情决定的。

通过官督商办，把原先“诡寄洋行”的买办资本争取过来，转化为完全意义的民族资本，其意义非同小可，使中国在外力冲击下靠自身的反应开始近代化，而不走殖民化道路——这已在第二章第三节论述过了。

买办资本加入官督商办企业后，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经营管理办法，使企业展现出活力和生机。譬如，唐廷枢奉札主持轮船招商局后，“把怡和、太古等一套买办制度完全移植到招商局”<sup>③</sup>，经营十分有方，再加上北洋大臣李鸿章动员官力支持，招商局得以在旗昌轮船公司发动的志在一举粉碎对手的毁灭性竞争中站住脚并反口吃掉旗昌，大获全胜。难怪有外国人评论道：“当唐氏在东方一家第一流的外国公司任职时，获得了丰富而广阔的经验，他正在运用这个经验去损伤这些外国公司。”<sup>④</sup>（按照另一买办郑官应总结自己经历的话来说，是“初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sup>⑤</sup>。）众所周知，开平煤矿是唐廷枢费尽全力千辛万苦地办起来的，“核其功绩，天下闻之”<sup>⑥</sup>。可以这样认为，李鸿章搞洋务民用企业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就是因为采用官府监督控制下的商股商办的官

① 经元善：《居易初集》，第 1 卷，第 54 页，《中国创兴纺织记》己亥十月。

② [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第 152 页。

③ 汪熙：《从轮船招商局看洋务派经济活动的历史作用》，载《历史研究》1983 年第 2 期。

④ 《洋务运动》（八），第 402 页，《田凫号航行记》。

⑤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第 8 卷，商务，《复考察商务大臣张弼士侍郎》，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第 620 页。

⑥ 徐润：《徐愚斋自述年谱》，第 89 页。

督商办形式,以及在创业阶段重用了买办。

由此可见,官督商办企业吸收买办资本,并非为外商作俵,而是使之转化为完全的民族资本,与外商进行商战,根据自身的力量,从事有限的挽权收利的活动,其“买办化”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至于把靠官督商办起家的盛宣怀资本说成官僚买办资本,就更荒诞不经了,因为盛氏连一天买办都没当过的。

### 三、垄断经营辨析

根据经济学的厂商理论,市场结构分为完全竞争、垄断竞争(不完全竞争)、寡头垄断(不完全垄断)、完全垄断等4种类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垄断较为少见(如某一城市的公共事业),完全竞争大致也仅在谷物等个别商品的产供销中才会出现,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即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垄断。

晚清官督商办企业中,上海机器织布局享有十年专利,是否就是10年之内在中国市场或江浙市场占据完全垄断的地位呢?不是的。因为洋纱已经大量涌入毫无关税壁垒保护的近代中国市场,在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办前,“英国呢布运至中国,每岁售银三千余万”,“于中国女红匠作之利,妨夺不少”<sup>①</sup>。创设该局,为的是以国产的机器纱、布投放市场,与进口的洋纱、洋布竞争,“稍分洋商之利”<sup>②</sup>。

上海机器织布局之所以享有十年专利是因为:当时华商还没有创设纱厂的意向,由洋务派重臣李鸿章大力主持作为首倡,此事

---

<sup>①</sup> 《李集》,奏稿,第24卷,第20页,《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

<sup>②</sup> 《李集》,奏稿,第43卷,第43页,《试办织布局折》光绪八年三月初六日。